

## 南齐王宝玉墓志考释 ——兼论南朝墓志的体例

邵 磊

2002年8月23至25日,由文物出版社、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南京市文物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凤凰台饭店召开,作为会议期间一项主要的学术活动,南京博物院专门举办了“院藏铭刻书法展”,供与会代表观摩。展品中,有《南齐王宝玉墓志》一石,以往未经著录,特别值得注意。

按萧齐一朝墓志,存世者屈指可数,此前所见,除民国五年(1916)出土于绍兴螭阳谢坞、为鲁迅先生等考为萧齐永明十一年(493)的《吕超静墓志》外<sup>①</sup>,就只有镇江博物馆1973年于句容县袁巷征集入藏的永明五年(487)《刘岱墓志》<sup>②</sup>了。故此《王宝玉墓志》之可珍视,不言而喻。爰不揣浅陋,先董理录文,再爬梳史籍,聊作疏证,甚望学界师长有以教我。

### (一)录文

齐故冠军将军东阳太守萧府君侧室夫人王氏墓志铭  
夫人姓王,字宝玉,吴郡嘉兴县昙溪里人也。建光宜映,  
有自来矣。夫人温朗明淑,神华玉丽,清规素范,夙炳芬  
誉。以建元元年纳于萧氏,恭雅恬懿,剋隆美训,享年□  
永。以永明六年四月庚戌朔九日戊午,卒于建节里中,  
春秋廿有八。粤闰十月丁丑朔六日壬午□,窆于临沂

县之黄鹄山。寂帐□阴，虚□长雾，秘迹徒留，芳徽□树。

铭文大司马参军事东海鲍行卿造

潜宝有耀，怀德有怜，幽闭之懿，播问宣音，薰诗润礼，越玉慕金，□约规行，清和佩心。陂途易永，夷数难常，中春掩辇，半露摧芳。方冥方古，孰云不伤，追昭轨烈，式讚泉房。息昂年六。

## (二)考证

志主王宝玉，史籍无载，今据《墓志》序文首行，知为吴郡嘉兴县人。嘉兴王氏，本江东豪族，在汉末孙策开辟江东的政治斗争中，以合浦太守王晟为代表的嘉兴王氏一族几乎被诛夷殆尽<sup>③</sup>。王宝玉与王晟是否为同一氏族，还有待考究。



据《墓志》题首，王宝玉为萧齐冠军将军、东阳太守萧府君的侧室夫人。查诸史籍，南齐时期，仕历与此萧府君相合者，惟仕宋终于治书侍御史萧道赐<sup>④</sup>第三子、梁文帝萧顺之弟、梁武帝萧衍从父萧崇之。萧崇之，字茂敬，“以干能显，为政尚严厉，官至冠军将军、东阳太守”<sup>⑤</sup>。齐永明四年(486)春正月甲子，富阳人唐寓之反，“于钱塘僭号，置太子，以新城成为天子宫，县廨为太子宫。弟绍之为扬州刺史。钱塘富人柯隆为尚书仆射、中书舍人，领大官令。献铤数千口为寓之作仗，加领尚方令。分遣其党高道度徐寇东阳，东阳太守萧崇之、长山令刘国重拒战，见害。崇之……至是临难，贞正果烈。追赠冠军将军，太守如故”<sup>⑥</sup>。按，萧崇之有妻毛氏，萧梁践阼，诏为“国太夫人，礼如王国太妃，假金章紫绶”<sup>⑦</sup>。今据志文可知，萧

崇之除娶毛氏为正室夫人外,别纳王宝玉为侧室夫人,此为史传所未载。

《梁书·萧崇之传》与《南史·梁宗室上》俱载萧崇之有四子,依次为萧景、萧昌、萧昂、萧昱。其中,除景母毛氏见诸载籍,余皆未详所出。按,萧崇之第三子萧昂,“字子明,景第三弟也。天监初,累迁司徒右长史,出为轻车将军,监南兖州”<sup>⑧</sup>,普通二年(521)“为散骑侍郎、中领军”<sup>⑨</sup>、太子中庶子,出为吴兴太守。大通二年(528),征为仁威将军、卫尉卿,寻为侍中,兼领军将军。中大通元年(529)为领军将军<sup>⑩</sup>。二年(530),封湘阴县侯,邑一千户。出为江州刺史。大同元年(535)卒,时年五十三。谥曰‘恭’”<sup>⑪</sup>。以萧昂卒于大同元年(535)、时年五十三岁来推算,萧昂当生于齐永明元年(483),王宝玉永明六年(488)卒葬之期,萧昂适届六龄,与《王宝玉墓志》篇末所记“息昂年六”符合。由此可证,萧崇之第三子萧昂,系王宝玉所出,此亦可补史传之阙。

萧崇之诸子中,萧昂秉政开明而颇有军功。先是在被征为琅玕、彭城二郡太守之际,“有女子年二十许,散发黄衣,在武窟山石室中,无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间,时饮少酒,鹅卵一两枚,人呼为‘圣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满山谷。昂呼问无所对,以为袄惑,鞭之二十。创即差,失所在”<sup>⑫</sup>。继而在广州刺史任上,挫败了江州刺史王茂之子贞秀潜结北魏降人杜景袭夺州城的图谋<sup>⑬</sup>。

《墓志》序文末行记王宝玉葬于临沂县之黄鹄山。据《故永阳敬太妃王氏墓志铭》,梁文帝萧顺之次子、追赠永阳郡王萧敷妻王氏“以普通元年(520)十月二十三日遘疾,十一月九日己卯薨于第,春秋五十有九……粤其月二十八日戊戌祔瘞于琅玕临沂县长干里黄鹄山”<sup>⑭</sup>。又据《故侍中司空永阳昭王萧敷墓志铭》,萧敷以齐建武四年(497)八月六日薨于庐陵王谘议参军任上,时年卅有四<sup>⑮</sup>。综以上述,或证侨置琅玕临沂县黄鹄山为梁武帝萧衍“应符受命”前萧梁宗室成员的卒葬地之一。由于《萧敷墓志》与《敬太妃王氏墓

志》的具体出土地点不详<sup>①6</sup>，故黄鹄山的地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sup>①7</sup>。今据南京博物院专业人员介绍，《王宝玉墓志》系出土于南京栖霞区甘家巷梁安成康王萧秀墓神道石刻群东北约二公里处的南京炼油厂厂区内，由此，不难匡定黄鹄山的大致范围，而梁永阳王萧敷夫妇合葬墓的位置庶几亦可推知<sup>①8</sup>。

《王宝玉墓志》序文与铭辞间，有“铭文大司马参军事东海鲍行卿造”题名一行。史载，“鲍行卿以博学大才称，位后军临川王录事，兼中书舍人，迁步兵校尉。上《玉璧铭》，武帝发诏褒赏。好韵语，及拜步兵，面谢帝曰：‘作舍人，不免贫，得五校，实大校’。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仪》十三卷、《乘舆龙飞记》二卷。弟客卿位南昌太守。客卿三子，检、正、至，并才艺知名，俱为湘东王五佐。正好交游，……及建邺城陷，正为尚书外兵郎，病不能起。景杂于死尸焚之。……检为湘东镇西府中记室，使蜀，不屈于武陵王，见害”<sup>①9</sup>。今按，志文中鲍行卿题名所衔“大司马参军事”，可补史传之阙。

永嘉丧乱以来，胡汉分治，南渡士族引颈北望，但自晋末刘宋以来，由于北伐屡次失利，兼以第一、二代南渡士族相继故去，庶族寒门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统治者偏安江左，耽于逸乐，再无克复中原、归葬祖茔的愿望。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士大夫们对于终制愈发重视，墓志的设置亦愈加郑重其事，以至延请名家撰作志文竞成一时风尚。综以相关的金石资料与文献记载，鲍行卿题名中的“造”字，宜属“撰文”之意甚明<sup>②0</sup>。从六朝墓志的文法沿革来看，惟萧梁以降，在墓志中专门列出撰造者题名始成定制<sup>②1</sup>。今《王宝玉墓志》既出，可证在墓志文字中添署撰者题名的做法，应可上溯到南齐。

与古代墓志多将题名署于序文之前的惯例不同，鲍行卿题名介于《王宝玉墓志》的序文与铭辞之间，这是墓志早期发展阶段的特例？抑或别有其他原因，殊值留意。今参校1980年9月出土于南京、撰人题名亦夹署序文与铭辞间的《梁桂阳简王萧融墓志》<sup>②2</sup>，则颇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萧融墓志》首题“桂阳王墓志铭序”，序文另行起，共338字，再续接“梁故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桂阳融谥简王墓志铭”题首及“长兼尚书吏部郎中臣任昉奉敕撰”题名，其后即四言铭辞计142字。按，任昉奉敕所撰《萧融墓志》，又见录于《艺文类聚》，然其内容仅为出土《萧融墓志》实有142字铭辞中的40字<sup>②</sup>，序文则一字未收。揆此，再联系到任昉题名在出土《萧融墓志》的行款位置，或可证《萧融墓志》全文仅铭辞部分为任昉所撰，序文作者另有其人。要之，南朝墓志由二人分撰序文与铭辞而合为一篇完整志文者并不鲜见，如《梁桂阳国太妃王慕韶墓志》的序文为“梁吏部尚书领国子祭酒王暕造”，序文后的四言赞辞则出梁武帝萧衍亲炙<sup>③</sup>；陈朝五兵尚书孙瑒“及卒，尚书令江总为其志铭，陈后主叔宝又题铭后四十字”<sup>④</sup>。除此而外，1989年南京西善桥砖瓦厂出土《陈故司空义阳郡公黄法氈墓志铭》，题名署“左民尚书江总制、太子率更令领大著作东宫舍人顾野王撰”<sup>⑤</sup>，或亦分撰序文与铭辞之证。因此，从鲍行卿撰造题名位于《王宝玉墓志》铭辞之前的情形来看，亦不能排除鲍行卿仅为《王宝玉墓志》铭辞部分撰人的可能性。总之，鲍行卿所撰造的是《王宝玉墓志》的通篇志文抑或仅是作为墓志主体的四言铭辞，对于以“好韵语”、在南齐一朝“以博学大才称”但却又篇章无遗的著名文士而言，《王宝玉墓志》的发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 注：

①顾燮光：《梦碧簪石言》卷二《南齐吕超墓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67页。

②陆九皋：《刘岱墓志简述》，《文物》1975年第6期。

③《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曰：‘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泉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乃舍之，余咸族诛。”

④萧道赐仕刘宋终于“治书侍御史”，见载于《梁书》卷二四《萧景传》。《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上·吴平侯景》略为“书侍御史”，当系避唐高宗讳，省“治”字。

⑤⑦⑧⑪《梁书》卷二四《萧景传》。

⑥《南齐书》卷四四《沈文季传》。

⑨《梁书》卷三《武帝下》“大通三年春正月庚申”条下作：“卫尉卿萧昂为中领军”。今附识于此。

⑩据《梁书》卷三《武帝下》，萧昂任领军将军为中大通元年(529)十一月丙戌。

⑫《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上·吴平侯景》。

⑬《梁书》卷九《王茂传》。

⑭见上海博物馆藏《梁永阳王萧敷夫妇墓志》宋拓割裱本第十七、十八、十九页，载《书法丛刊》第五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⑮见上海博物馆藏《梁永阳王萧敷夫妇墓志》宋拓割裱本第六页，载《书法丛刊》第五辑，同前揭书版。

⑯《梁永阳昭王萧敷墓志》与《梁永阳敬太妃王氏墓志》原石出土后，分别被移至清风乡居民井侧与清风乡路旁，始经著录，其原始出土地点遂不可知。详参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十四《碑刻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0、141页。

⑰据程恩泽跋《梁永阳昭王萧敷夫妇墓志》宋拓割裱本云：“长干里黄鹄山，则于书无所见。《诗·毛传》云：‘山间涧水曰干’，是长干随处可指。称若大长干、小长干，则在今江宁聚宝门外，与此有南北之殊矣”。按，程跋虽道出了《敬太妃墓志》所云长干里黄鹄山的大致方位，但却未能指出黄鹄山相对准确的地望。

⑱有学者根据南朝墓葬的规制，推测1962年在南京栖霞区甘家巷西0.5公里、距梁安成康王萧秀墓神道石刻群西南约3公里处的蔡塘村发掘的一座大型六朝墓“很可能即萧敷夫妇合葬墓”。详见罗宗真《梁萧敷墓志的有关问题》，《考古》1986年第1期。今以自识葬地亦为黄鹄山的《王宝玉墓志》的出土地点为据，可证《梁萧敷墓志的有关问题》一文对萧敷夫妇墓的葬地推测有误。

⑲《南史》卷六二《鲍泉传》。

②①以“造”为“撰”，可通过例证的方式加以阐述。今立于南京栖霞区甘家巷、东北邻梁安成康王萧秀墓神道石刻群的《梁始兴忠武王萧憺神道碑》，碑文末尾镌有“侍中尚书右仆射宣惠将军东海徐勉造、前正员将军吴郡监制吴兴贝义渊书、丹阳房贤明刻字、防阁吴兴郢元上石”诸题名，审知“徐勉造”即“徐勉撰”之意甚明。山西大同东郊出土北魏《元淑墓志》亦题“永平元年岁次戊子十二月庚戌四日癸丑建太常博士青州田徽宝造，书者相州主簿魏洽”，则《元淑墓志》志文出田徽宝撰亦无可置疑。除此二例实物资料外，以“造”为“撰”，文献亦提供了相应的佐证，如《魏书》卷八二《常景传》载：“世宗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其兄右仆射肇私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崇、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简之，光以景所造为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凡此种种，皆可证鲍行卿为《王宝玉墓志》的撰人身份，应无疑义。

②②迄今所知，出土刘宋墓志并无一例署记撰造题名者，而此前仅见的南齐《吕超静墓志》、《刘岱墓志》，亦无撰造题名，惟萧梁至陈的墓志，凡志文保存完好或泐损较少者，皆见撰造题名。可见，在墓志上署记撰造题名至迟在萧梁时期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习尚。

②③南京市博物馆(阮国林执笔):《南京梁桂阳王萧融夫妇合葬墓》，《文物》1981年第12期。

②④(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五《职官部一·诸王》载“梁·任昉《抚军桂阳王墓志铭》曰：‘于昭帝绪，擅美前王。绿图丹纪，金简玉筐。世载台鼎，地居鲁卫。沛易且传，楚诗将说。桐圭谁戏，甘棠何憩’。与新出土《梁桂阳王萧融墓志》相较，主要缺中段相对独立成篇的关于萧融德艺道学及其为东昏侯所害的部分写实性内容。又，出土墓志原石在“甘棠何憩”后，尚有“式图盛轨，宣美来裔”句，亦为《艺文类聚》录文不载。《艺文类聚》录文“地居鲁卫”前云“世载台鼎”，颇有不解，今据出土墓志原石知为“圣武定鼎”，《艺文类聚》录文有误。

②⑤《陈书》卷二五《孙瑒传》。

②⑥王素:《陈黄法氈墓志校证》，《文物》1993年第11期。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市博物馆